

朴槿惠哲学思想研究

邢丽菊

【摘要】 2013年6月底韩国总统朴槿惠成功访华，中国大地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朴旋风”。朴槿惠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她的人生经历具有传奇色彩，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精通汉语，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哲学不仅帮助朴槿惠度过了人生中的绝望时光，更培养和锻炼了她客观理性的思维能力。她的人生经历和相关施政理念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之道、忠恕之道、义理之道、天命之道等几个关键要素。虽然这四个方面有可以重复或叠加的部分，但就总体而言，朴槿惠哲学思想的核心最终可以归结为儒家的“内圣外王”。她通过读书来深刻思考人生，正确认识人生，最终通过修身养性的“内圣”，逐步找回内心的宁静，从而为“外王”奠定了基础。哲学对朴槿惠产生了积极有用的影响，这值得我们深思并学习。

【关键词】 朴槿惠；诚信；忠恕；义理；天命；内圣外王

【中图分类号】 B3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3)06-0095-(12)

【收稿日期】 2013-09-01

【基金项目】 2012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12JZD007)

【作者简介】 邢丽菊(1980-)，女，山东淄博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韩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上海 200433)

一、序言

作为韩国以及东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备受世人瞩目。因为她身上有着太多的传奇因素：她的父亲朴正熙曾是韩国总统；她曾代替母亲行使了5年“第一夫人”的职责；她曾处在权力的顶峰，后因父亲遇害遭受众叛亲离，而一度跌入地狱；她曾隐居18年，只是“为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而重返政坛；200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事件让她与死神擦肩而过，这又更加坚定了她竞选总统的决心；2007年党内总统候选人竞选失败后，她又整装出发，终于在2012年底获得了过半数的高支持率而成功当选为总统。她的人生大起大落，可谓是“在绝望中成长，在希望中前进”，是“绝望创造希望”的过程。

以朴槿惠访华为契机，中国大地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朴旋风”。人们对她的高度关注，除了以上传奇经历外，更重要的则是她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中国所展示的真诚友好态度。翻阅朴槿惠的传记和日记可知，她多次提到中国古典《论语》、《孟子》、《中庸》以及其他人文类书籍对其心灵的涤炼，特别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更是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帮助她

战胜了人生的绝望,锻炼了她哲学思维的能力。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长期以来处于人文学边缘的哲学,怎么会对一位女总统有如此大的影响?

何谓“哲学”?哲学一词最初来源于古希腊语,意即“爱智慧”。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72~公元前497)第一次使用了philosophia(爱智慧)这个词语,并且把自己称作philosophis(爱智者)。他认为,philosophis(爱智者)生来寻求真理,还把爱智者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①德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1772~1801)也曾说过,“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在西方,哲学一直是与真理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

在中国,“哲”一词起源很早,历史久远,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古代的“哲”或“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的学问精深者。在东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和基本原则。而学术意义上的哲学,通常是指学者对这些基本原则的质疑和反思,并试图对此进行理性重建的一种学问。冯友兰曾指出:“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思想”。^②

朴槿惠喜爱哲学,她的思想和行动中凸显了很多哲学的印记。但朴槿惠属于政治人物,政绩应该是评价她最好的标尺。然而笔者认为,政绩仅仅是衡量政治人物事业成败的依据,而政绩的好坏因人和立场的差异而有不同。鉴于此,本文对朴槿惠的政治路线或风格不予置评,而是将焦点置于其人生经历以及相关政治理念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上。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人是天地间的小宇宙,只有深入剖析了人的内心世界,才能全面把握其人生。下面将以中国哲学的几个关键词:诚信之道、忠恕之道、义理之道、天命之道为核心来分析一下朴槿惠的哲学思想。

二、诚信之道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备受儒家推崇的基本道德规范。中国传统文化对诚信的探究,可以追溯到先秦儒家。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已出现“诚”的概念,《尚书·太甲下》有“神无常享,享于克诚”的记载,此处“诚”主要是指对笃信鬼神的虔诚。《周易·乾卦》中讲“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认为君子说话立论应该诚实不欺,才能建功立业。此处“诚”已经开始具有日用人伦的道德意义。后来到了孔子,“诚”虽未形成理论概念,但孔子多处讲“仁”,其修己爱人的内在意蕴与“诚”是一脉相通的。到了孟子,“诚”逐渐成为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孟子指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③认为“诚”是顺应天道与人道的基本法则。荀子开始以“诚”涉政,把“诚”从做人之道扩展为治世之道,指出“诚”乃“政事之本”。儒家经典《大学》将“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成为连接“格物”、“致知”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至宋明时代,理学家不仅对“诚”的内涵作了思辨性演绎,还将其视为维护封建“天理”的精神元点加以阐发。可见,儒家高度重视“诚”在成己、成人与成事中的重大作用,视之为道德的根本。^④

“信”最早也是见于《尚书》。《尚书·汤誓》中有“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尔无不信,朕不食言”^⑤等关于信的7条记载,其中多数指的是对鬼神的虔信。到了后来,“信”逐渐成为经世致用的道

① 参见百度百科“哲学”词条。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2页。

③ 《孟子·离娄上》。

④ 夏澍耘:《中国古代诚信源流考》,载《光明日报》2002年4月9日版。

⑤ 《尚书·汤誓》。

德规范。孔子十分强调“信”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治国即使“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因为“民无信不立”。^①孔子还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②认为“信”是国与国相交的道义标准。到了孟子,他把“朋友有信”^③列为五伦之一,视其为封建社会道德评价的基本伦常规范。

在中国古代,“诚”与“信”单用较多,连用较少。春秋时期管仲曾将“诚”与“信”连用,他指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④认为诚信是集结人心并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保证。由于“诚”、“信”意义相近,故常常被互换使用。虽然二者各有侧重,但相互贯通,互为表里。正如北宋张载所言:“诚故信,无私故威”。^⑤可见,诚信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交朋结友、进德修业之基,是治国安邦之道。崇尚诚信已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特质。

就朴槿惠的亲身经历来看,也许是父母遇害后遭遇了太多的众叛亲离,她的人生以及施政信条中尤其注重诚信。她曾经指出:

“以坦荡的胸怀和诚实的心待己待人,这样才能称得上是堂堂正正的人生。……别看是一次小小的失约,可失去的却是诚信,而丢掉诚信的人注定要受到人们的白眼。失去诚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会变得淡漠。……在我看来,一个人的诚信是金钱难以置换的法宝。”^⑥

“信誉和名誉就像人生的时光一样,是千金难买的贵重物品。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感觉不到它的珍贵,只是东窗事发时才捶胸顿足而后悔不已。”^⑦

“失去信赖的社会会使所有的一切变成悲伤和阴郁。有的人从一开始就背信弃义,有的人则是后来因立场不坚定而逐渐在权势、名誉和金钱的驱使下背信弃义。”^⑧

可见,她将诚信视为比金钱还贵重的人生法宝,认为失去诚信的社会是令人不安和担忧的社会。人失去诚信是因为内心防线垮掉了,而且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背信弃义给她带来的常人无法体会的痛苦让她尤其重视诚信原则。

基于此,她在个人交往和国家外交中也尤其重视心与心的真诚沟通和交流。2013年6月底的访华之旅,朴槿惠将其命名为“心信之旅”,这更突出了她的这一理念。她曾在自己的日记中指出:

“只要以礼相待,真诚交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多则感情越深。……以情交友,以心感人,这是把我们拧成一股绳的强大动力。”^⑨

“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对话是那么的愉快和惬意。只有这样的对话才能使人间的真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⑩

① 《论语·颜渊》

② 《论语·学而》。

③ 《孟子·滕文公上》。

④ 《管子·枢言》。

⑤ 《正蒙·天道》。

⑥ 《朴槿惠日记》,183页。

⑦ 同上书,179页。

⑧ 同上书,52页。

⑨ 同上书,134页。

⑩ 同上书,135页。

于是,朴槿惠的“心信之旅”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结果。她的自然和真诚也拉近了与中国人民之间的距离。访华期间,她在与商业界人士聚餐时引用中国俗语说“先做朋友,后做生意”;她在清华演讲时特意选用了与清华校徽颜色一致的紫色正装,而且演讲期间因个别词语发音不准而重新纠正并报以善意的微笑;她深谙中国传统中“落叶归根”的习俗,主动提出要归还志愿军的遗骸回国安葬等,都向中国人民如实展现了自己的诚意和善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中韩友好。

这种真诚沟通的做法,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感而遂通”^①的原理。《周易》认为,天地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②只有通过交感的过程,阴阳双方才能凝聚为恒通畅达的和谐体。外交的对象是国与国,具体来讲则是国民对国民,再细化来看则是人与人。在中韩两国交流中,沟通与共感非常重要,“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③感情是增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第一要素。为了实现真正的共感,就必须对话。对话是实现沟通和共感的前提条件。

除此之外,她执政后提出的“韩半岛信任进程”也是这一思维的产物。“韩半岛信任进程”是朴槿惠政府对北政策的主干,即在建立信任过程中积累南北间的相互信任,并通过这种信任,将南北关系发展到相互合作的更高阶段。具体来讲,信任进程可以分为建立信任和交流合作两个阶段。初期阶段,尊重过去南北间已经达成的协议并履行实践,然后通过无条件的人道主义援助来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第二阶段,根据信任的进展情况,开展南北间互惠性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交流,从而构筑更高阶段的信任。尽管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撤走开城北方员工等一系列行为有些威胁的意味,尽管国际社会和韩国政界对朴槿惠提出的这一进程还有不少争议,但朴槿惠致力于通过真诚开放的对话并构建信任的做法是值得我们肯定的。这表明了她在践行“诚信之道”。

三、忠恕之道

忠恕是儒家重要的伦理范畴,是仁爱思想的基本内涵,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顾名思义,“忠恕”就是忠诚和宽恕。分而言之,“忠”是中人之心,为人谋事;“恕”是如人之心,推己及人。《论语·里仁》很好地解释了“忠恕”的内涵: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综合《论语》的内容,我们也可以概括认为,“忠”的内涵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④“恕”的内涵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⑤前者指的是,如果自己想要有所作为,也要尽心尽力让别人也有所作为,成人之美;后者指的是,将心比心并推己及人,自己不愿做的事,绝不强加于人。关于“忠恕”,朱熹注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⑥若

①《周易·系辞上》。

②《周易·咸卦》。

③同上。

④《论语·雍也》。

⑤《论语·卫灵公》。

⑥《论语集注》。

能竭尽自己全力并一心一意为别人做事,视他人如自我,则自然能够做到推己及人。可见,忠与恕其实是可以实现相互统一的“一道”,不能割裂开来。若将二者分离,则孔子“一以贯之”的道便成了“两道”,会犯逻辑上的错误。

忠恕之道不仅可以处理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而且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本之道。《孟子》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使尔也。”^①这里的“所欲”,不仅是民之所欲,而且是君与民之共欲。君主对臣民若能实行“忠恕”之道,则可以得民心;得民心,便可以得天下。圣王如果能够以“己之所欲与不欲”来体恤下民,则下民可以衣食安逸富足,于是圣王就可以“不降席而匡天下”,^②这也是孟子所说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③

关于尽己之“忠”,我们从朴槿惠代行“第一夫人”可以充分看出来。尽管只是 22 岁的花季少女,但面对母亲突然去世的噩耗,她完全顾不上个人的悲伤,便不得不在丧礼结束后的第六天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前去参加一项排球大赛并致辞。不仅如此,她每天要翻阅上百封的民情申诉,并一一反映给父亲或者亲自去处理;她要经常陪同父亲去全国各地考察民情,并现场作业;她要接待各国来访的政要首脑等。如此的忙碌使得她恨不能将钟表的时针固定下来。长久的劳累使得她嘴角经常起泡,并伴随着持续低烧。事实证明,她将这一角色诠释的非常成功,最突出的事例便是她成功说服美国前总统卡特保留驻韩美军,解决了父亲都无法解决的难题。

关于推己之“恕”,我们从朴槿惠关注女性、教育等方面可以看出来。尽管朴槿惠是有名的“三无女人”,但作为一名女性政治人物,她对以上问题依然倾心关注。面对 2005 年民主党(当时的执政党)强行通过《私立学校法》修正案,她以决不让步的姿态,在严冬酷寒中进行了 53 天的抗争示威,最终使得执政党屈服;^④为了照顾年轻的大国家党女性党员们,她硬是力排众议,在党舍内部创立了“快乐幼儿园”,让年轻的妈妈们可以安心工作;^⑤面对别人质疑其没有家庭和子女而缺乏相应经验时,她的回答是:

“世宗大王不是奴婢出身,但是他深刻了解奴婢的苦衷,给她放了 100 天的产假。同时也给了她丈夫一个月的休假,以便照顾她。”^⑥

这些都体现了她以忠恕之道来体恤国民,从细微处做起,努力为国民排忧解难。在今年年初的总统就职演讲中,朴槿惠明确指出,“要开启一个老有所依,少有所养,人人都会受到祝福的国民幸福时代”。她要让韩国的孩子们都能健康成长,让大学生们毕业后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让劳动阶层都能劳有所得,让国民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建设幸福家园。她将这些视为自己崇高的使命。^⑦

不仅如此,即使在上任之初面对朝鲜核试验等军事威胁时,她虽一方面强烈谴责朝鲜违反国际规定的做法,但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朝鲜的粮荒和生活困难,多次强调不能因此中断和减少

① 《孟子·离娄上》。

② 《韩诗外传》。

③ 《孟子·公孙丑上》。

④ [韩]朴槿惠:《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蓝青荣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5月,228-233页。

⑤ 同上书,238页。

⑥ [韩]金炳完:《绝望创造希望:朴槿惠的传奇人生》,邢丽菊、陈超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209-210页。

⑦ 同上书,232页。

对北的人道主义援助。

关于忠恕,朴槿惠曾如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拿‘忠恕之道’为例来说。它的实践原理出乎意料的简单。‘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朋友,先施之’。也就是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别人着想,己所欲先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

“《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依据人类的本能和欲望类推出来的标准,也是正确对待他人的标准。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代表孔子思想的仁义的本质也在这里。要常把自己置于他人的立场上去审视,这就是仁。”^②

这些都表明她明确忠恕之道的含义,并努力践行之。典型的例子便是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利他之心”,认为其是最高境界。^③

“我们的使命和天职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诚实履行‘利他主义’。只要我们树立这种观念,谁都可以忠实的完成自己的使命。”^④

“利他之心,是征服痛苦与虚妄的方法。……凡是以私欲为出发点的事情,其结果无一不是以痛苦和虚妄结束一切。”^⑤

正是从“利他之心”出发,朴槿惠才认为建立了庞大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以及创建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的秦始皇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伟人。因为前者具有占有广袤领土的私欲,后者具有想当一国之君的私欲,而且他们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将无数条生命推到战场上牺牲,这实际上相当于暴力,所以她不同意这种权威或者强压式的统治理念。与战争相比,她更重视和平;与降服相比,她更重视和谐;与利益相比,她更重视情义。^⑥这些都表明她在追求一种“忠恕之道”。

四、义理之道

儒家的义理思想是一种阐明人在具体现实中当行之道的行为规范,主要从伦理领域阐明了人面对现实问题时所做的正确判断和道德实践。因此,“何种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如何行动才是正确的”以及“正确的价值判断的基准是什么”等都属于义理思想的范畴。

“义理”这一词在宋代以前的诸多文献中已经出现过,如《吕氏春秋》中有“心若禽兽,长邪苟利,不知义理”^⑦和“义理之道彰,则暴虐奸诈侵夺之术息也”^⑧等;《管子》中有“乱主之动作失义理”^⑨和“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论衡》中有“儒生究义理”等。以上“义理”大都是邪利、暴虐、奸诈等的反义词,基本都包含着道德的含义。

“义”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含义,其现代意义主要有:1. 宜;2. 善;3. 仪;4. 宜与善之道;5. 与

① [韩]朴槿惠研究会:《朴槿惠日记》,陈冰冰译,2013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183页。

② 同上书,172-173页。

③ 同上书,190页。

④ 同上书,191页。

⑤ 同上。

⑥ 《绝望创造希望:朴槿惠的传奇人生》,165页。

⑦ 《吕氏春秋·明礼》。

⑧ 《吕氏春秋·怀宠》。

⑨ 《管子·君臣下》。

人结骨肉之亲(如义兄弟);6. 字句之意等。因此,“义”可以缩略为追求现实生活中合宜的“时宜性之义”与实现正义之善的“原理性之义”两层意思。换言之,它一方面具有重视事实判断的状况性,另一方面具有重视价值判断的道德性。

义在先秦时代主要指的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周易·文言》中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论语·季氏》中也说“行义以达其道”。这两处的义强调的都是在现实实践中的行为。

除此之外,义还要求在既定情况或场合下采取正确而又恰当的行动,体现了一种“宜”的恰当性。因此,《中庸》中说“义,宜也”,朱熹也在《孟子集注》中说“义者,行事之宜”,《荀子》中 also 说“义谓各得其宜”。由此来看,义是处理日常待人接物之关系的最恰当原理,它在任何时候都要求“时中之宜”。但若想正确的做好符合时中之宜的判断,就需要理这一普遍性的规则。传统儒家则从人的内面心性来寻找答案。

关于人的普遍性,孟子曾如下指出:

“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①

此处的“理”意味着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以及存在于一切现象变化中的法则,终极意义上指的就是天理。与之相比,义是只有人才具有的当为的规范原理。具备了它,人才可以为人并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理与义虽然属性不同,但它们却以共同的基础……天理为媒介。因此朱熹将“义”解释为“天理之所宜”。

可见,儒家义理思想的真正内涵在于实现“原理性之义”与“时宜性之义”的和谐,这就是《中庸》“合内外之道,故时措之宜也”的境界。

具体到朴槿惠来讲,我们会发现,她尤其注重正义和原则。

“正义是我们生存于这个世界唯一的守护神。失去正义意味着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智慧也源自于正义,失去正义也就无所谓智慧可谈。……失去正义的自我伤害会招致难以承受的打击,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②

“世间有一种不亚于甚至是高于血缘关系并将人们真正联系起来的纽带,这就是正义。失去正义的结合,即使表面很牢固,可一旦遇到利害关系等问题便顷刻瓦解。只有在正义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的结合才是最牢固的人际关系。”^③

正是在这种正义的基础上,她才反复强调自己要追求“正直的人生”。

“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正直的生活,以及它所带来的内心平静和愉悦。”^④

“守道和正直是我一生的行为准则。只有坚守这一准则,我的心灵才能得以平静。这一准则不允许我离开正道半步,我只好沿着这个正道走下去。”^⑤

她将这种正直的生活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认为这会给人生带来无与伦比的快乐。

关于原则,朴槿惠更是视其为“政治的生命”。她曾于2007年在媒体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中指出:

① 《孟子·告子上》。

② 《朴槿惠日记》,229页。

③ 同上。

④ 《朴槿惠日记》,169页。

⑤ 《朴槿惠日记》,141页。

“我一直认为信赖和原则是我个人政治的生命。我将用这种毫不动摇的原则和信念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将与国民一同努力。”

可见,朴槿惠将履行与国民的承诺当作政治人最重要的价值,而且在行动中也一直贯穿着这个信念。政治人只有切实履行与国民的承诺,并将其运用到国政管理上才能建立一个国泰民安的社会。朴槿惠也不止一次的指出,遵守原则和信赖的国家才是先进国家。

“我们国家要想成长为先进国家,必须首先要遵守原则和约定,营造一个相互信赖的社会氛围。与制定新的政策和制度相比,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重视对国民承诺的政治文化。我觉着这是非常重要的。”^①

以上突出的是义理思想中的“原理性之义”。而就“时宜性之义”来讲,我们会注意到朴槿惠的这个观点:

“人生之路可以比喻为驾驶员常用的‘换挡’,意即我们应随时根据需求来调整行进的速度。过好自己的人生并不意味着人生路上事事如你所愿。更有意义的人生其实是,即使遇到困境时,你也应该积极地去适应,去挑战,应该做到机智灵活的换挡,争取转危为安。这才是正确的人生,发展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

在她看来,最高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也不是所有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迎刃而解的人生,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做到适时、适宜而又智慧、能动的调整,这样才能实现自身的飞跃发展。^②

在分析朴槿惠的政治纲领时,我们会发现“韩半岛信任进程”与“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都是体现了一种“时宜性之义”的义理思想。在处理南北关系时,虽然以前韩国历届政府实行了各种多样化的政策,但并未带来朝鲜的变化,也未能真正促进南北关系的实质发展。一直以来,朝鲜不断发起军事威胁,韩国政府时而制裁,时而妥协,而朝鲜在取得国际援助后最终又演变成新一轮的威胁。朴槿惠政府为了切断这种恶性循环并引导朝鲜走向国际轨道,认为构筑信任是核心因素,于是提出了这一信任进程。而且朴槿惠政府在推进这一进程的过程中也发现,单凭韩国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需要借助东北亚国家各国的协力合作,共同来推动多边对话、三边会谈、六方会谈等,为建立信任做出积极努力。“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多边对话体制便是构建“韩半岛信任”的辅助性机制。她的这一施政纲领正是将自己的哲学理念结合现实情况所做的适当调整,反映了“时宜性之义”的义理思想。

五、天命之道

中国古代的天命思想非常丰富,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立论。其中,道家的天命多是指宿命、命运,墨家的天命是指神的意志,法家的天命是指君王的意志,而儒家的“天命”多是指发自我内心理想使命。

就儒家来讲,天命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如《尚书·召诰》记载:“有夏服天命”,《诗经·商颂》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那时的天命都具有一种有神论的宗教色彩,体现了人们对无法抗拒的上天的盲目崇拜和迷信。后来到了《周易》,虽然没有天命的描述,但却有了

① 《绝望创造希望:朴槿惠的传奇人生》,144页。

② 同上书,67-68页。

对“天道”的理解。《周易》开始对自然进行相对客观的理解和认识,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并提出了著名的“三才之道”,即“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①此处的天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天命”,指的是非宗教色彩的阴阳变化的客观规律,这就较以前进了一步。而到了《中庸》,天命则与人性结合起来,最著名的论述则是“天命之谓性”,指的是天命化为人的本性。人禀赋了天命而生,这也更加凸显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后来到了宋明理学,这一思想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理学家们直接将这种性命名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对比,认为这种性是纯善无恶的人的本性,并据此提出了“性即理”这一命题。如此,天命与人性实现了一以贯之的结合。

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朴槿惠曾接受过天主教洗礼,并信仰上帝。那时,她眼中的天命一定程度上具有上帝的色彩。但在更多时候,朴槿惠视天命为人所无法抗拒的客观自然的规律,她有时也用“上天”、“天意”等词语来表述。

“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事例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和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天命,都是按照上帝安排的剧本来演绎的。……人类违抗天命、肆意妄为,注定要受到上帝的惩罚。”^②

“只有领悟天命且满足于天命的人才能拥有无忧无虑的平静心态。”^③

“人最大的病痛在于傲慢,极度的愤怒也是来自傲慢。只要平时常有敬畏上天的念头,就不会受到傲慢病痛的侵扰。”^④

“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后我要过更加智慧的人生,我将顺应天意为我安排的一切,包括我的言行。”^⑤

“只要我们彻底领悟天意的真谛,我们的利他之心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⑥

“对周围每个人行善就是对上帝的忠诚,时刻不忘修身养性就是对上帝最虔诚的祈祷。上帝赐予我们的智慧就是心正和气正。……人类怎么会有超越上帝的智慧?”^⑦

综上所述,朴槿惠的天命有些宿命主义的色彩。她认为人如何抗争也斗不过上天,人只不过是在上天业已安排好的剧本里出演着自己的角色而已,无法修改剧本和剧情。但这并不代表着她要求人们消极被动地接受天命而无所作为。她相信上天这一权威性的存在,但她更强调的是,人要因此懂得知天敬天,敬畏天命,不要妄自尊大,更不要肆意妄为。世间所有的傲慢和愤怒都源自于人的自以为是,源自于人错误地以为“万事应该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⑧人要抛弃这种错觉,多顺应天意,“忠实于上帝的旨意,默默履行上帝的旨意并以此充实自己的人生,就足够使自己心满意足的了”,^⑨这样才能过正直的生活,才能心安理得。

虽然上天和天意看似远不可及,但朴槿惠也不忘指出,“上帝就在正直的心里”,“现实正向

① 《周易·说卦传》。

② 《朴槿惠日记》,151页。

③ 同上书,173页。

④ 同上书,151页。

⑤ 同上书,93页。

⑥ 同上书,191页。

⑦ 同上书,221页。

⑧ 同上书,151页。

⑨ 同上书,160页。

我们传达天意,我们的现实就是天意”。^①基于此,她才说“我的天堂既不是来世,也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的世界,是我眼下正在打造的世界”。^②

而且对政治人物来讲,天意与民意也是相同的,因为“国民就是上帝”。这一点也对应于《尚书·泰誓中》所讲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意即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老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老百姓所听到的。所以朴槿惠指出,“政治家必须以赢得民心为自己最大的奋斗目标。……领导者需将国民的期盼当作自己的期盼”,^③所以还要通过修身养性来顺应天意,赢得民意。只有将自己置身于国民之中,才能在国民心目中树立中流砥柱的形象。

六、结论:内圣外王

以上笔者分别从诚信、忠恕、义理和天命四个方面来分析朴槿惠的人生经历和有关施政纲领中体现的哲学思想。尽管从严格意义来讲,以上四个方面有可以互相重复或叠加的部分,但就总体而言,笔者认为朴槿惠哲学思想的核心最终可以归结为“内圣外王”。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主要涵盖了儒释道三家,但就整个思想发展史来看,儒家的比重无疑是最大的。作为一门人文教化的学问,儒家的最终目的便是通过个人身心的修养来化成天下,这突出的表现在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换言之,就是“内圣外王”,对内要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要实行王道来统治天下,它体现了古代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

“内圣外王”一词最初源自《庄子·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在庄子看来,“内圣外王”是天下治道术之人所追求的理想。就《天下》篇来看,外王的条目中还包括了很多法家的因素。可见,这一思想是儒道法三家相结合的产物。虽然不直接出自孔门儒家之说,但儒家对此作了最大程度的阐发,最终成为儒家的基本命题。

在“内圣”方面,孔子主张要“为仁由己”。^④他指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⑤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己”为出发点,以“治人”为目标。孔子曾指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⑥在孔子看来,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才能达到内圣;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治国安邦,从而达到外王之目的。换言之,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会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实践中,才会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内圣外王”体现了政治与道德的统一。

政治家内圣的关键在于要正,尤其要正德。关于此,孔子有一些著名论述,如: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⑦

① 《朴槿惠日记》,153页。

② 同上书,221页。

③ 同上书,182页。

④ 《论语·颜渊》。

⑤ 同上。

⑥ 《论语·宪问》。

⑦ 《论语·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②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③

可见，为政者首先要做的是“正”，具体指的就是正其身心，正其德行，然后才能为政。“正”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前提。

朴槿惠的思想和言行也证明了她一直在朝着“内圣外王”努力，可以说她是这一思想的践行者。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她 18 年隐居生活中博览群书并修养身心的典型事例。她在 2007 年 3 月接受韩国《每日经济》记者采访时，曾如下指出：

“二十多岁时，我曾面临难以承受的考验和痛苦。……当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本书改变了我的。”

不仅如此，她还在《遇见我人生的灯塔——东方哲学》一文中指出：

“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蕴含着做人的道理和战胜人生磨难智慧，让我领悟到了如何自正其身，如何善良正直的活着。……”

自与《中国哲学史》相遇，我恢复了心里的宁静，明白了之前所不能理解的许多事情。……从此人生的苦难成为激励我的伙伴，真理成为照亮我前程的灯塔。”

除此之外，朴槿惠还习读了大量人文学的经典著作。她曾在其自传《在绝望中成长，在希望中前进》中指出：

“那段时间我读了《法句经》、《金刚经》等佛教经书和《圣经》，也读了东方哲学的相关书籍和《贞观政要》、《明心宝鉴》等。我将这些书放在床头，以便随时可以拿起来阅读。其中若有喜欢的字句，我会随时抄写在笔记本上，每当心烦的时候就会拿来翻翻看看。”^④

正是这 18 年博览群书的修身生活，让她学会放下很多事情，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让她懂得了“驱除私欲，堂堂正正做人，尊重对方为人谋平安忠实于眼前生活，这是实现内心平静的基本原则”^⑤；让她懂得了“修养是对他人的理解和关怀，是培养利他之心的重要手段”^⑥；让她懂得了“我正则世正，世安则我安”^⑦；让她懂得了“地位是树干，修养则是树根。只有具备自我节制、自我修养与自我牺牲精神，才能问心无愧的坐上那些位高权重的位子”^⑧。

读书的同时，她也写了很多文章，并出版了《要是能出生在普通家庭》、《点滴的人生》、《以苦难为友，以真实为灯》、《我的母亲陆英修》等著作。而且成为大韩人文协会的一员，并被授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学位。^⑨

可见，在艰难困厄的 18 年漫漫时光里，朴槿惠在孤独中思考，在痛苦中找寻。绝望的人生，

① 《论语·子路》

② 同上。

③ 《论语·为政》。

④ 《绝望创造希望：朴槿惠的传奇人生》，55 页。

⑤ 《朴槿惠日记》，210 页。

⑥ 同上书，214 页。

⑦ 同上书，215 页、218 页。

⑧ 《绝望创造希望：朴槿惠的传奇人生》，24-25 页。

⑨ [韩]朴槿惠：《在绝望中成长，在希望中前进》，智慧之屋出版社，2007 年 7 月，162-163 页。

要么倒下毁灭,要么站起重生。她选择了后者,读书唤起她站立重生的希望,读书引导她深刻的思考人生,并正确的找寻人生。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①通过18年修身养性的“内圣”,朴槿惠领悟到了人生的三件法宝,那就是“我的正直明朗之心;我的正直明朗之心带给周边人的平和;让我每天都过得勤勉充实的分分秒秒的时间”。^②如此的修养也反映了《中庸》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奠定了她最终实现“外王”的基础。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朴槿惠在“外王”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众多的困难和挑战,而且这也注定了是一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③的艰辛之路。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以哲学为首的人文学对朴槿惠的人生产生了积极而有用的影响。这也正应了冯友兰所说的那句话:“中国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④如此,朴槿惠才会在与人文学专家的座谈会上特别指出“人文学是理解人类和指引我们该如何生活、照亮生活道路的智慧之灯”,^⑤并在《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中重点提出加强中韩人文纽带,成立“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这些都突出了她对人文的关注和热爱。相信更多的人会从朴槿惠的人生哲学中深刻感受到人文学的力量,并以此为榜样,积极开创属于自己的人生。

(责任编辑 李英武)

① 《孟子·尽心上》。

② 《绝望创造希望:朴槿惠的传奇人生》,91-92页。

③ 《离骚》。

④ 《中国哲学简史》,5页。

⑤ [韩]许振:《朴槿惠总统:人文学是照亮生活道路的智慧之灯》,载韩国《中央日报》2013年8月8日版。